

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运动

■高宝新 部耿豪



我军政治整训历史回眸

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川川战役胜利原因时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导同志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

西北野战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既是在各解放区开展整党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大背景下，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开展全军性“诉苦”“三查”运动指示的贯彻落实，更是西北野战军适应战争形势的快速演进、加强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陕北发动重点进攻后，西北野战军克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和部队新组建带来的重重困难，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等战役的胜利，初步稳定并扭转了西北战场局势。与此同时，由于作战频繁、条件艰苦和部队规模的扩大，西北野战军也逐漸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累积起不少问题：一些官兵对我军的宗旨和使命缺乏系统了解，为谁当兵、为谁而战的信念模糊；部分官兵对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厌倦情绪。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

11月27日，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部队需要有一时期训练，需要普遍深入开展“诉苦运动”与土改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增强团结。29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召开第1、第3、第6纵队旅以上干部会，总结榆林、元大滩战斗的经验教训，研究确定部队的整训计划。12月4日，西北野战军进至米脂、绥德、清涧、靖边地区，开始冬季整训。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运动正式开启。

“诉苦”是整个运动的突破口。运动开始之初，各部“诉苦”的具体方法各有不同，因而效果也有明显差异。这其中第1纵队第358旅运用“典型引路”的经验最为成功。旅政治委员余秋里在第714团指导“诉苦运动”，发掘出刘四虎、路新理等几位苦战士典型。他们的“诉苦”激发起全团乃至全旅官兵的强烈共鸣，每每使台上台下哭声一片。这种来自身边战友的现身说法，其效果是任何抽象说教都难以比拟的。彭德怀对此非常重视，亲自指导。一天，他来到第358旅，听了汇报，又去参加“诉苦大会”，还找官兵座谈，了解情况。他对余秋里说：“你们搞‘诉苦’‘三查’很有意义，这使政治工作得到一种新样式。有了彻底的群众路线，就能充分发扬民主。你们要决心抓下去，抓出成效来。”回到野战军司令部后，彭德怀即组织干部去参观学习，推动更大范围的“诉苦运动”。

在“诉苦运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三查运动”随即展开。“三查”的主要对象是干部，目的是查清每个人的阶级成分和态度，并针对个人在思想、工作和战斗中的表现进行整顿。在“三查”的同时，西北野战军要求各部建立互助小组，实行记功、记过、查功、查过等制度，从而使运动得以向更深的领域扩展。与此同时，通过发扬民主，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从党内到党外的群众性思想运动。各部不仅纯洁了队伍，而且提拔了一批群众推选出来的干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部队中存在的斗志不强、责任心不高等问题得到纠正，团结氛围空前浓厚，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更加紧密，共产

党员在部队中的威信大大提高。

1948年1月，彭德怀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各纵队领导汇报前一阶段“诉苦”“三查”情况，并交流了经验。会后，部队在“诉苦”“三查”的基础上，转入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6月，西北野战军又开展夏季整训。各部利用战斗空隙时间，开展“三评运动”。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以支部为核心，贯彻群众路线，按照民主方式，采取实事求是的说理方法，由群众评议领导干部斗志强不强、能不能指挥、会不会贯彻政策。通过奖励罚过，那些作风顽强、有勇有谋的同志受到表扬，意志衰退又存在其他问题的同志受到批评和处分。这极大调动了广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积极性，练兵打仗有了新的进步。

8月，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分析了“诉苦”与“三查”运动前西北野战军内部存在的各种思想状况和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开展运动的方法目的。他表示，经过整军，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部队战斗力、共产党员在部队的威信均大大提高，这说明群众路线与民主作风整军的方针是正确的。

事实上，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从时间跨度到方式方法，都走在各野战军的前列。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运动的做法引起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关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及时发现、精心培育西北野战军的成功经验，从全局高度不遗余力地加以总结和推介，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新式整军运动在全军的兴起。其他野战军积极借鉴西北野战军的经验和做法，并结合自身实际加以落实，使新式整军运动在全面扎实的推进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版学术支持：褚 银



第 6448 期

版式设计：贾国梁



军史文苑

黄桥烧饼黄又黄哎，黄黄烧饼慰劳忙哩。

烧饼要用热火烤哎，军队要靠老百姓帮……

——《黄桥烧饼歌》

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北渡长江，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7月中旬，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指挥，所属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为迅速打开苏北抗战局面，指挥部决定东进黄桥，开辟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28日傍晚，黄桥镇上枪声密集，由远而近，第二天凌晨枪声渐止。晨光熹微中，一条墨迹未干的标语映入人们眼帘：“团结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落款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由此，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小雨落在青石板上，淅淅沥沥地敲打着沉睡的街巷。新四军的队伍在夜色中悄然行进，草鞋裹着泥泞，却不曾踏入一户民宅的门槛。官兵蜷缩在屋檐下，用斗笠遮住半湿的军装，有人低声哼着家乡的小调，有人嚼着冷硬的干粮。

清晨，黄桥镇的百姓推开门后看到，石板路上零星的泥印和墙角几捆码得整整齐齐的稻草——那是官兵“借宿”后留下的“谢礼”。部队出发后，一位老妇人颤巍巍地捧着一筐热腾腾的芋头追到镇口，却被战士婉拒：“大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铁律。”铁律无声，像小雨般无声浸润着百姓的心



1940年，向黄桥挺进的新四军部队。

资料图片

“铁石心肠”的军需长

■刘小花 欧阳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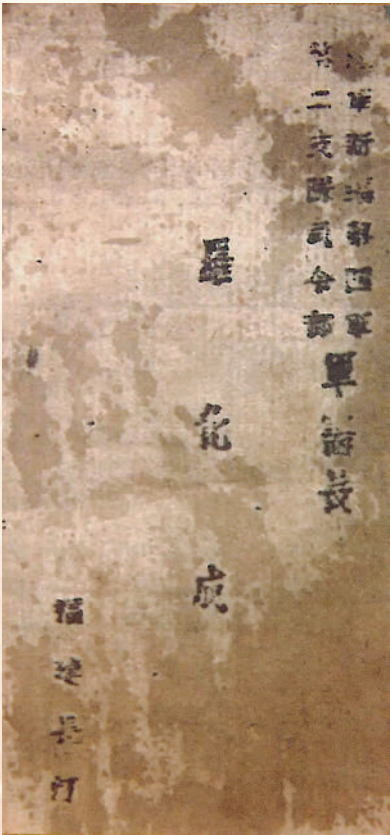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一张略有破损的名片静静诉说着一个纪律如铁的故事。名片纸张虽已泛黄，但墨迹却依然可辨：“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军需长罗化成，福建长汀”。这方寸纸片背后，是一位共产党人在烽火岁月中用生命书写的动人篇章。

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和地方的物资异常匮乏，“军需长”这个职务可不好当。要让部队没有后顾之忧，就必须想尽办法保障部队的后勤工作。一颗子弹、一个铜板、一根棉丝，在军需长眼中都格外珍贵。罗化成，这位军需长因严格执行纪律，令人敬畏不已，被官兵称为“‘铁石心肠’的军需长”。

罗化成，1895年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南阳区南山村（今上杭县南阳镇南阳村）。他父亲是位医术高明中医。少年罗化成跟随父亲学医，悬壶济世的仁心在他心中生根发芽。1927年，当革命的星火在中国大地燎原时，这位乡村郎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将医者仁心升华为革命理想，成为中共长汀县委早期领导人之一。

自参加革命后，罗化成就将军纪视为心中不可逾越的铁律。一次，部队临时驻守在村上，一位老乡送来一只老母鸡，战士见盛情难却便收下了。他得知后，严厉批评战士道：“军纪你忘记了吗？这是违纪行为。”战士听后自知理亏，低头认错，将鸡送还老乡。

罗化成生活节俭，对自己近乎苛刻。为了把不多的津贴费省下来给战士们买药品，他的牙刷几乎被



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部军需长罗化成的名片。

古田会议纪念馆供图

磨平了，还舍不得换。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罗化成瘦骨嶙峋、身体虚弱。他到部队检查工作，战友王培臣见他身子日渐消瘦，便买了鱼、肉请他吃。他温和而坚定地拒绝道：“我不喜欢‘特殊’，你吃什么，我也

吃什么。”

1937年7月，罗化成奉命回闽西南工作，先后任新四军第2支队军医处主任、军需长等职务。罗化成经常深入连队，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1938年1月，新四军第2支队奉命在龙岩集合，准备开往苏皖抗日前线。负责第2支队后方留守工作的罗化成率领部分新四军官兵深入连城新泉、芷溪一带农村，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和艰苦生活，罗化成积劳成疾，心脏病不时发作。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司令员陈毅曾多次劝他去后方养病，他总是婉言谢绝，继续带病坚持在抗日前线工作。陈毅亲切地用“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无处下金钩”这句古诗劝他。他风趣地说：“目前正是抗战关键时期，斗争需要我，不正是‘下金钩’的时候？”1940年2月27日，罗化成心脏病复发，经抢救无效在江苏溧阳逝世，终年45岁。

那一天的溧阳寒风呜咽。新四军，在溧阳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这位把一生献给革命的忠诚战士。

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张名片时，仿佛能穿越时空，看见一位瘦削却挺拔的“军需长”的身影，在崇山峻岭间奔走，在枪林弹雨中坚守。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铁石心肠”——那是对原则的坚守、对纪律的敬畏，更是对信仰的至死不渝。这种精神，如同闽西的红土地一样厚重，如同武夷山的丹霞一般永恒。



图文军史馆

“背布袋”的供给部长

■李宝臣 刘小云

1930年的井冈山，成片的竹林在风中摇曳轻吟，山间泉水灌溉着庄稼，一切欣欣向荣、充满生机。时任书记长的赵镨接到一个消息，组织让他负责军需保障工作。此后，赵镨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会计科科长、红9军团供给部部长等职。

“后勤干部最重要的品德是一尘不染，不能做到廉洁奉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别当后勤干部，当了也不是好干部！”在1932年军委总供给部创办的供给学校的课堂上，赵镨这样说。

1933年，根据地军民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由于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军队经费十分紧张。心中烦闷的赵镨决定走访调查、寻找解决问题的法子。当了解到盐的价格非常昂贵之后，他顿时眼前一亮，萌生出一个念头。

他马上召集人手熬盐换肉，并在心中盘算着：一块银元只能买一两盐，一斤盐可换十斤猪肉！一想到能解决当前的困境，大家的工作干劲更足了。随着用盐换来了粮食和肉，部队的伙食保障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然而，这位身形消瘦的“大管家”，即便自己的肚子填不饱，也要把口粮匀出来，分给其他人。长时间下来，他就患上了胃病。胃痛的时候，汗透衣衫。但他觉得，相比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战友，这点疼痛根本不值一提。

除此之外，赵镨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他随身背着的两个布袋，就像战士手中紧握的钢枪一样。

红军长征途中，他所在的红9军团运输转运物资的群众有千余人。为把筹措的物资收入、分发数目



记清楚，部队走到哪里，赵镨就把物资账目的数字记到哪里。

此时，他身上共有两个重要的布袋，一个布袋装行军所用的银元，另一个布袋装部队物资收支的账簿。一次部队转移途中，赵镨不小心丢了布袋。万般焦急的他赶紧往回跑，终于找回了遗失的布袋。检查了一下，里面的账簿等物没有丢失，他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那之后，他更加小心谨慎。白天，他会时不时用手摸一摸布袋，防止丢失，但晚上睡着了怎么办？

办法总比困难多。他决定每次睡觉前，用砖石架上3根扁担，将两个布袋分别放在扁担两端，头枕着钱

采取隐蔽接敌、分割歼敌于运动之中的方针来打击韩德勤部。

决战前夜，黄桥镇上烧饼店的炉火映红了半边天。烧饼店的王掌柜把面案搬到街心，面团在案板上翻飞，芝麻香混在硝烟里飘向阵地。一时间，男女老幼推车、挑担、肩扛，从四面八方为前线的新四军官兵送烧饼，络绎不绝。前线的战壕里，官兵捧着热气腾腾的烧饼，那饼上仿佛还留有老乡手心的温度。

9月30日，国民党军兵分数路，似恶狼般扑向黄桥。10月4日，国民党军第89军第33师一部向黄桥东门进攻；独立第6旅从高桥南下。第6旅装备精良，其先头部队进至距黄桥北门两三公里处时，后尾已过高桥，全队均已进入我军设伏地带。我军立即出击，激战过后，第6旅被拦腰斩成数段，旅长翁达饮弹自杀。国民党军又以猛烈炮火向黄桥东门进攻。黄桥告急，一路敌人攻进了城内。第3纵队司令员陶勇带领部队把敌人从东门击退，配合第2纵队一部一举歼灭敌第33师。

至5日，我军全歼敌第89军军部，军长李守维在逃窜中坠溺河中。6日，我军又于营溪歼敌增援的预备队大部。韩德勤见大势已去，只能率残部逃向兴化。我军乘胜追击，至10日，连下富安、安丰，席卷海安、东台。此役，我军歼灭国民党军1.1万余人。黄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雨水冲刷着街巷，将草鞋的泥印、烧饼的香气都冲散了。黄桥的百姓却永远记得，那支淋着雨而来的队伍，未曾踩坏一畦菜地，未曾白拿半块烧饼。这场战斗的胜负，早在官兵夜宿屋檐时就已注定——人心，从来不是靠枪炮征服的。

